

乌克兰危机的一种解读*

——基于国家特征视角的分析

王志远

内容提要:历史上,乌克兰曾经遭受不同帝国的长期占领,从而产生“双重被动控制”和“弹性边界”两个国家特征。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开始表现出新的国家特征,“双重对外依赖”与“弹性认同”被不断强化。“颜色革命”之后,这两个特征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都显著增强,导致平衡型外交战略陷入“两难”,一场深刻影响国际格局的乌克兰危机由此爆发。运用“双重对外依赖”曲线与“弹性认同”政治预算线构建起来的分析模型解释乌克兰危机,具有逻辑方面的优势,并且可以说明乌克兰这个国家存在着“三元悖论”,即在“双重对外依赖”、“弹性认同”和“不成熟民主政治”之间,三者不能同时兼容,这一结论对于乌克兰未来走向的判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 “双重对外依赖” “弹性认同” 政治预算 颜色革命

一 引言

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与美欧之间展开了激烈博弈,国际上对乌克兰的关注也随之增多,但大多数关注于“危机”本身,缺乏对乌克兰进行本质性探究。反而是较早的经典理论内含的对乌克兰问题的深刻洞见,对于分析当前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例如,美国外交学家布热津斯基将乌克兰称为五个“地缘政治的支轴国家”之一,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合作与竞争的战略解析”(编号:14CGJ008)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编号:2015M5703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文章完成后得到辽宁大学程伟教授和殷红博士的审读及帮助,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刘显忠研究员对文中的历史部分予以了修订,《欧洲研究》的匿名审稿人提出了中肯建议,特此感谢。当然,文章偏颇和不足之处,由作者负责。

与该国相对应的地缘战略国家则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① 这是基于大国视角的定位(尤其是美国),将对乌克兰以及南部黑海的控制看作俄罗斯维护欧亚地缘政治主导权的必要条件,其中深意至今仍颇具启发性。现实中,乌克兰也的确扮演过美国遏制俄罗斯的排头兵,例如美国支持的古阿姆集团(GUAM,由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国家的首字母组成),主要包括里海周围国家,旨在通过建设新的能源运输线路削弱俄罗斯的能源地位。^② 显然,这种从“现实主义”的大国战略视角出发,将乌克兰国内政治诸多因素置于国际关系领域之外,不仅将其看作一个完全被动的“客体”,甚至忽略了该国自身存在的民族、历史、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容易产生“唯外部大国力量决定论”。事实上,乌克兰与其他几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特征。

从这个视角看,考虑到这次乌克兰危机中的深层次因素,虽然不能忽视外部世界对乌克兰的影响,但也不能忽略这个国家对俄罗斯和欧盟的“相互依赖”,更不能无视“本体论”视角中的国家“观念”特征,即这个国家的历史文明变迁。

作为“文明冲突论”的创始人,亨廷顿认为沿着文明界限分析,乌克兰实质上是一个“文明冲突国家”,它的命运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俄乌之间爆发冲突;二是乌克兰文明断层线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实体,其东部可能与俄罗斯融合,分离问题首先开始于克里米亚;三是乌克兰继续作为统一、充满裂痕的独立国家向前发展。^③ 这样的预测,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具现实意义。俄罗斯学者也赞同“文明冲突论”,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具有两个层面:在物质、技术、经济、政治等领域已经出现了标准化和倾向一致化特征,但文化领域内的传统和规定却相互排斥。^④ 我们仔细分析后发现,俄罗斯学者所持观点实质上是为了拉近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关系,因而强调历史渊源而并非“文明冲突”,毕竟三国都可以追溯到基辅罗斯大公国时代。可见,在复杂的文明中,既存在分离的倾向,也存在整合的倾向。然而,近年来的现实情况却是,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之间具有较为稳定的区域整合趋势,而乌克兰则表现为总体倾向于向欧洲靠拢,与俄罗斯的关系具有间断性和不稳定性。^⑤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密切程

^① 其他四个国家分别是土耳其、伊朗、阿塞拜疆和韩国,参见[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② Иван. Сафранчук, “Концепция Новый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и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Большо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7, Июль 2013, с.43-53.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146页。

^④ Владимир. Соколенко, “О некоторых научно-политологических аспектах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 Январь 2012, с.97-98.

^⑤ Тамара. Гузенкова, “Украина и белорусси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модел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 Январь 2012, с.100.

度,已经到了“西方国家很少将白俄罗斯视为独立国家,而是将其看作一块俄罗斯的‘飞地’”。^①当然,紧密的俄白关系不仅取决于两国经济、外交和文化方面的共同理念,也有“亲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政府的“坚定支持”,后者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反观乌克兰,不仅没有与俄罗斯发展为“紧密盟友”,反而在激烈的国家抉择中产生内部冲突,最终引发乌克兰危机。

显然,为了解读和判断乌克兰危机,需要清晰地分析乌克兰的国家特征。在理论范式方面,本文希望借鉴“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已经被广泛运用的理论,从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综合视角出发,尝试建立更为抽象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就是基于“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和“文明冲突论”这两种观点,提出“双重对外依赖”与“弹性认同”两个概念,为探讨乌克兰危机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参考。

二 现实中的历史逻辑

乌克兰位于欧洲东部,是独联体国家中人口规模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国家,即使从整个欧洲范围看,乌克兰国土面积仍然位列第二(仅次于俄罗斯),但其他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却明显落后于欧洲发达国家,甚至在独联体中也不具有优势。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开始显现,东北方与俄罗斯、白俄罗斯接壤,西部则毗邻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既是联结欧洲与亚洲的纽带,也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桥梁。然而,历史上,虽然处于同样的地理位置,乌克兰却很少扮演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反而如其乌克兰语(Україна)和俄语(Украина)的称呼,属于“边远、边疆或边陲”,在“修昔底德”式的大国争夺和冲击中,演绎着民族和国家的变迁史。

作为乌克兰民族精神的起点,哥萨克起义以及盖特曼政权的建立,现在仍然被乌克兰人视为历史上的光辉诗篇。当时,在哥萨克人聚集的要塞(塞契)已经组织起议会,其称呼——拉达(rada-рада)被沿用至今,并且本地居民已经使用“边疆”或“边陲”这样的称呼,这是第一次以“乌克兰”命名这块土地。^②然而,哥萨克人并非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其中既包括当地居民鲁塞尼亚人,也包括很多波兰人、摩尔多瓦

^① Юрий. Гавриличко, “Вопрос рисков, комплиментарности, совместны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развития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рынка и согласова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внешних рынка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 Январь 2012, с.104-111.

^② [美]保罗·库比塞克:《乌克兰史》,颜震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1页。

表1 乌克兰东西部的历史发展

时间	政权模式	西部	东部	总体状态
公元9世纪 60年代-1240年	基辅罗斯 大公国	统一于基辅政权为核心的第聂伯河两岸		快速发展,但内部纷争时有出现
1240年-1648年	权力附庸	先被蒙古侵略,后被波兰、立陶宛占领,最终成为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一部分		严重衰退,呈现宗教、民族多元化特征
1648年-1918年	经过多次战争和冲突,逐渐变为两大帝国的一部分	民族意识环境相对东部宽松,乌克兰民族文化由西向基辅渗透传播	沙皇俄国统治,以“小俄罗斯”称呼乌克兰地区,民族文化受到压制	民族主义觉醒,不再使用鲁塞尼亚人之称,开始以乌克兰人称呼,谋求统一
1918年-1945年	在独立与被占领之间徘徊	曾短暂宣布独立,主要地区受控于波兰,小部分地区属于捷克	始终受控于苏联	民族和国家认同已经形成,但缺乏军事政治实力
1945年-1991年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处于统一状态,但东西部文化、社会、经济差异巨大,总体受苏共中央领导		随着苏联地位由强到弱,乌克兰民族独立情绪日益高涨
1991年至今	乌克兰	东西部差异逐渐显现在国家政治中,西部人民倾向欧洲,东部人民倾向俄罗斯,历届总统则选择平衡外交模式		从经济政治转型走向“颜色革命”,最终爆发危机,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

资料来源:根据[美]保罗·库比塞克的《乌克兰史》整理。

人和希腊人。这些人最大的共同点并非民族认同,而是有着相似的生活习惯和彪悍作风,很像一个规模、组织和结构都更为庞大的“水泊梁山”。然而,就是这个多民族团体,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点燃了民族团结与复兴的篝火,使乌克兰人第一次感受到自由与民主,以及由此所获得的民族自尊和独立人格。

但是,也不能由此认为哥萨克人创造了乌克兰的国家和民族历史,毕竟他们并未

使乌克兰彻底摆脱大国权力附庸状态,虽然获得了短暂的自治权力,却将乌克兰置于大国争夺的夹缝中。在乌克兰西部,哥萨克人并没有真正推翻波兰人的统治,此后哈布斯堡帝国(1867年后为奥匈帝国)占领波兰,再次将乌克兰纳入自己的帝国版图中。在乌克兰东部和基辅,哥萨克人在与波兰人的战争中,为了寻求武装援助,赫梅利尼茨基这位英勇的盖特曼(领导人)在1654年与俄国沙皇签署了《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尽管俄国参与了与波兰人的战争,但很快两国就达成了和解,并实现了对乌克兰的瓜分。

自此,乌克兰追求民族独立的梦想破灭,反而陷入了严重的东西部分裂状态。穿过基辅的第聂伯河,曾经是欧洲通往黑海的重要水运线路,沿途分布着诸多重要城市。然而,就是这条“母亲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着“界河”作用,将乌克兰划为泾渭分明的东部和西部,位于版图中间的基辅则屡次遭遇大国的争夺。此时的乌克兰,在其历史版图的外围缺乏一个明显的边界,除了南部黑海沿岸外,无论是东部与俄国之间,还是西部与波兰之间,既没有山川河流等具有地理优势的“硬界限”,也缺乏建立在民族意识、宗教和文化等基础之上的“软界限”。

可以认为,历史上的乌克兰(按现代国家版图界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处于两个不同帝国的“双重被动控制”之下,国家版图也伴随着不断的战争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从地理意义上而言存在着“弹性边界”,即屡次在遭受战争洗劫后大幅度变更国家版图。

三 “双重对外依赖”与“弹性认同”:从演变到确立

统治国际政治理论数十年之久的现实主义,经过汉斯·摩根索到肯尼思·华尔兹的发展,其关注点逐渐从国家间直接冲突演变为结构性冲突。实际上,乌克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都处于结构现实主义所阐述的等级秩序中,以此获得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发展空间。正如华尔兹所说:“等级秩序的好处是与代价相伴生的。而且,在等级秩序中,实现控制的手段成为互相竞争的目标”。^①如果用冲突理论来解释乌克兰早期历史发展则更为合适。正是战争决定了乌克兰的历史走向,大国的争夺使得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欧亚大陆上的“均势”周而复始地循环。对于乌克兰的内政外交发展来说,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演变轨迹具有“直接性”、“偶然性”和“无序性”三个特征。

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刚刚结束,整个欧洲都沉浸在依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①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18页。

所构建的和平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国家领土和国家独立等原则,并将引发冲突和战争的宗教根源彻底排除,确立了“教随国定”准则。欧洲这种局面,实际上是英、法等大国在空间范围上达成了“均势”,从而开始创建国际政治领域的各种行为准则。然而,此时的乌克兰,刚刚开始具有民族主义独立特征的哥萨克起义。然而,这次大规模战争并没有确立国家地位,更谈不上确定国家和民族认同。此后,东部地区属于东正教,而西部地区在波兰的强制灌输下,逐渐转向了天主教。在“后威斯特伐利亚时期”,理论上已经不再允许因宗教因素发动战争。因此,即使当时乌克兰具有“双重被动控制”特征,并且帝国之间存在因争夺而爆发冲突或战争的可能,也无法“拉平”横跨第聂伯河的宗教鸿沟。

应当说,在基辅罗斯时代,弗拉基米尔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直接决定了此后国家的历史方向,相当于选择了与欧洲融合,而不是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地区融合。对于欧洲国家的进步,宗教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恩格斯认为,伊斯兰教由于经济发展,产生了宗教世俗化,也会通过起义和惩罚恢复对教义和信仰的尊重。“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相同或大致相同。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让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与此相反,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人民起义中,宗教外衣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陈旧的经济制度最终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迈进”。^①然而,“双重被动控制”下的乌克兰,在1054年欧洲基督教分裂后,虽然存在着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对立,却没有爆发过建立新经济制度的宗教革命。并且,这种宗教隔阂产生于不同帝国的控制之下,而并非乌克兰“由内而外”地爆发革命,宗教冲突作为推动国家进步的积极作用自然也无法发挥。

不仅新的经济制度没有建立,旧的经济制度反而不断强化。乌克兰历史上主要的经济特征应当是“传统农业”^②生产方式。这片土地具有发展农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土壤、灌溉、温度等条件均非常适合大田作物生长,直到现在仍然是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基地。因此,处于控制地位的帝国,一直将乌克兰定位于“粮仓”或“谷仓”、帝国的农业生产基地,导致乌克兰长期缺乏工业基础。这种发展状况,必然导致武器装备落后,

^①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

^② 即劳动生产率低、收入水平低、缺乏技术革新动力的农业生产阶段,参见[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更是无法摆脱“双重被动控制”的尴尬境地。恩格斯曾经说,“克里木^①战争时,军舰只是两层或三层的木质舰船,装有60-100门火炮,这种舰船主要还是靠帆力航行,有一部马力很小的蒸汽机,只是起辅助作用……不久以后,军舰也装上了铁甲;起初还很薄,4英寸厚的装甲已经算是很厚重的了。但是火炮的进步很快就超过了它,装甲每加厚一次,就有新的更重的火炮轻而易举地打穿它。”^②“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③基于这样的观点,恩格斯批判杜林所说的“暴力本原”,提出支配大工业的经济力量才是决定暴力的基础。而乌克兰恰恰缺少支持武装技术进步的工业,这一点在海洋权力争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黑海海域始终受帝国控制。并且,即便达成某种“均势”状态,也取决于处于控制地位的大国关系,而非乌克兰本国所能决定。因此,乌克兰不仅谋求独立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而且无法摆脱“双重被动控制”局面,两种宗教、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更是被不断强化,反而呈现出与帝国相互融合的可能,客观上也造就了国家的“弹性边界”特征,这种局面直到二战之后才彻底改变。当然,打破这种国家特征的仍然是战争,苏联控制乌克兰东西部全境后,“双重被动控制”随之消失,边界也随之固定下来,不再具有“弹性”特征。

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已经考虑到战争所制造的“占领”与“认同”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分析乌克兰历史具有一定的启发性。马基雅维里曾经对不同政体条件下战争入侵所产生的巨大反差进行分析,他认为土耳其皇帝(皇帝与臣仆之间构成的集权国家)和法兰克国王(国王与贵族组成的分权国家)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很难入侵,但战争胜利后很容易占领,因为除了皇帝以外的其他人很难获得人民的信赖;而后者相对容易入侵,但却难以占领,因为持不同政见的贵族会重新成为“革命者”。^④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上的乌克兰不仅容易被入侵,也非常容易被占领。

但是,如果完全从现实主义分析视角出发则无法全面而深入地解释乌克兰如何从“双重被动控制”转变为“双重对外依赖”,以及如何从“弹性边界”转变为“弹性认同”。因此,需要引入与乌克兰时代发展趋势相契合的理论观点,对乌克兰这个国家进行“再定义”。这可以从两个概念出发:一是自由主义范畴中的“对外依赖”概念;二是建构主义范畴中的“认同”概念。毕竟,现实主义将国家定义为一个单独并且理性的国际行为体,这近似于将国家看作“黑箱”,无论其民族、宗教、历史如何发展,在“均势”中都可以一概而论,这相当于忽略了乌克兰这个国家所特有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状

① 克里米亚——引者注,下同。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③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60页。

④ [意]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21页。

态。二战之后,国家行为事实上已经存在一定的约束,大国对乌克兰的争夺与博弈也表现出“间接性”、“必然性”和“规范性”三个特征。

独立之后的乌克兰,边界问题基本清晰,其“弹性”特征不再凸显,也不再处于“被动控制”地位,战争和冲突的威胁也变得次要,现实主义理论对于该国的解释力随之下降,这正是运用“对外依赖”与“认同”两个概念的意义所在。

基欧汉和奈认为,国家间相互依赖中会产生权力,“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相互依赖并不局限于互利的情境。”^①这意味着“权力”与“对外依赖”实际上是一种“替代关系”,对于乌克兰来说,无论是在西部还是在东部,事实上都处于“依赖大、权力小”的境地,因此无疑处于“对外依赖”状态。尽管国家获得了独立,但在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乌克兰仍然处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当各种恩威并施的战略贯彻到乌克兰时,这个国家实际上处于对西方和俄罗斯“双重对外依赖”状态。这种依赖关系很大部分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造成的。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乌克兰可谓是经济转型中的“差等生”,既没有像中东欧国家那样快速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没有像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那样依靠资源禀赋实现经济增长。因此,乌克兰虽然获得了国家主权的独立,但国内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高企、“影子经济”规模庞大、产业结构低级化、对外过度依赖等方面问题突出,并且始终“辗转腾挪”于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其“双重对外依赖”不断强化。^②至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争夺,则出于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利益考量,仍在现实主义的逻辑框架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概念,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但是,乌克兰不同于其他几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因为其不仅处在特别明显的“双重对外依赖”境地,更为重要的是,其表面统一的国内存在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弹性认同”。

观念与认同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与前苏联外交政策以及冷战结束密切相关,其分析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过渡到建构主义领域。^③在乌克兰,之所以会出现“弹性认同”,与“双重被动控制”和“双重对外依赖”均有很大的关系。在内部认同方面,历史上由于受控于不同帝国,乌克兰东西部存在文化宗教隔阂。对于乌克兰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外部认同,即无论处于“被动控制”之下,还是处于“对外依赖”之中,国内民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② 参见王志远:“乌克兰经济:从‘辗转腾挪’到‘内忧外患’”,《欧亚经济》2015年第2期,第40-51页。

^③ 参见[美]罗伯特·赫尔曼:“认同、规范和国家安全:苏联的外交政策革命与冷战的结束”,[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众都必然对外部世界与乌克兰的关系进行评价,如果认同处于良性互动发展,则自然有利,但以乌克兰发展经历看,这种认同感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由此产生了“弹性认同”特征。

乌克兰国内对俄罗斯(苏联)的认同产生于近现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波兰国内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为了建立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强大帝国,从1920年开始进攻乌克兰。波兰军队打到基辅后,苏俄军队开始全面反攻,兵临华沙,此后波兰又迫使红军后撤。1921年,波兰与苏俄通过《里加和约》确定了所谓“永久边界”,尽管白俄罗斯一块人口稀少的巨大领土被波兰占有,但乌克兰领土基本得以保全。^①这种紧密的联盟关系在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时达到了顶峰,但此时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际上仅限于东部地区,首都设在哈尔科夫,而并非今天乌克兰的全部。二战之后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东西部地区得以统一,然而由于当时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化,历史上形成的宗教文化隔阂实际上处于被压制状态,而不是促进其相互融合。当然,当时的苏联当局也采取了很多思想文化领域的措施,以强化乌克兰民众的历史认同感。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赫鲁晓夫为纪念《佩列亚斯拉夫协议》签署300周年,在1954年将克里米亚赠送给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当时的苏联当局看来,由于同属于一个联盟,克里米亚的归属实际上属于“体制内”问题,既不会影响联盟的版图,又能够强化乌克兰人对俄国历史的认同感,重新建立斯拉夫人民的友谊,从而构建起更加紧密的国家认同,淡化俄国对乌克兰的统治与剥削。这种将历史上的控制,转变为国家联盟的做法,实质上是在淡化统治。例如,纪念《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但不会纪念《安德鲁索沃条约》,尽管两者之间具有实质性的联系,因为前者代表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武装援助,后者代表着帝国对乌克兰的统治。当然,这次看似符合苏联联盟利益的“克里米亚”赠与,却成了日后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的“催化剂”。之后,前苏联时期很多重要事件,客观上也在破坏民众对苏联所形成的认同观念,例如乌克兰大饥荒、大清洗、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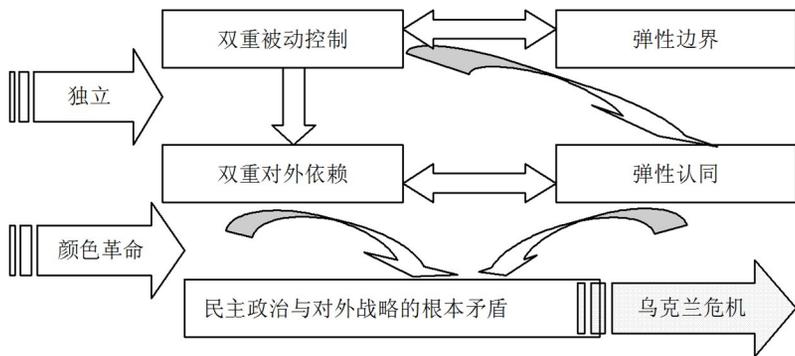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不仅在独立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坚决,并且作为独联体创始国,始终没有签署独联体《宪章》,这显然是在寻求更具灵活性的对外战略选择。^②乌克兰国内对俄罗斯的认同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部分地区工业相对发达,与俄罗斯经济往来密切,地区文化也比较接近,尤其在俄罗斯为乌克兰提供各种援助后,认同感更

^① [英]E. H. 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徐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7页。

^② Тамара. Гузенкова, “Украина и Белорусси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модел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 Январь 2012, С.100-103.

是随之增强。而乌克兰对欧盟的认同,则更多产生于冷战结束之后,尤其在西部地区。这里不仅天然具有与欧洲文化相近的历史传统,而且由于国内经济发展落后,很多人奔赴临近的欧盟国家务工,如果能加入欧盟,这些劳务人员收入水平和工作条件都会大幅度改善,因此很多人对欧洲心存向往。尽管这种外部的“认同”在东西部的差异比较明显,但却具有非常鲜明的“弹性”,很多时候会受到经济、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较大变化,这恰恰是理解乌克兰这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另外一把关键的钥匙。

图1 乌克兰的国家特征演变



注:图由笔者自制。

为了更加准确地厘清“双重对外依赖”和“弹性认同”这两个概念,图1描绘了其产生、发展与相互作用的关系。应当说,“双重对外依赖”既是由历史上“双重被动控制”演变而来,也与近现代乌克兰国家发展模式密切相关;而“弹性认同”来自于历史上的“双重被动控制”以及近现代的“双重对外依赖”。这两个国家特征共同决定了乌克兰民主政治与对外战略的根本矛盾所在,也是导致“乌克兰危机”的基本原因。

四 从“颜色革命”到“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自独立之后,“双重对外依赖”与“弹性认同”始终存在,但在这两者之间基本处于间接影响状态,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矛盾冲突。乌克兰国内的情况是,无论是以苏联领导人身份继任总统的克拉夫丘克还是政治丑闻一度缠身的库奇马执政,乌克兰在发展方向上都相当迷茫,内政外交一度陷入混乱,但基本可以得到平息,并没有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危机。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双重对外依赖”和“弹性认同”这两个特征并不重要,以至于无法解释当前的乌克兰危机?答案是否定的。应当说,这两个特征任何一个单独存

在,或是不发生联系地同时存在,都不会产生根本矛盾,然而如果联系起来,则会对国家内政外交的稳定性和主动性构成潜在威胁。产生这种联系的原因,与乌克兰“颜色革命”特征的政治民主化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进行系统地回顾和反思。

“颜色革命”在原苏联地区爆发,既有苏联解体所沿袭的政治背景,也有贫困、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等社会背景,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即地区和族群矛盾问题,这些“内因”加上美国官方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外部推动,掀起了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民主化浪潮。^①在这些国家中,乌克兰又是极为特殊的一个。

“颜色革命”爆发之时,乌克兰总统已经不再像克拉夫丘克和库奇马时期那般大权在握,主要负责国防和外交,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这些内政事务,则由总理负责,并且总理的任命权完全由政党政治选举出的450名议员构成的“最高拉达”(乌克兰议会)决定,而不是由总统负责提名。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实行民主化改革,实际上形成了单纯以国家对外战略作为政治民主化基础,而经济、社会等在西方国家占有重要分量的竞选要素,却被排除在外。因此,乌克兰形成极为特殊的政权结构,既产生了尤先科与季莫申科先联合、再破裂的权力组合,也出现了尤先科与亚努科维奇这两位明显持不同政见的总统和总理组合。此种政治模式在乌克兰出现,并非没有道理。毕竟,该国刚刚启动政治民主化,如果总统权力过大,不仅会阻碍刚刚建立的民主体制,而且也会使国家发展模式完全“押宝”在总统选举之上,这种将总统和总理、国际和国内分开的政治模式,可以说是乌克兰在民主化道路上选择的一种柔和折中模式。自此,乌克兰政治中形成了“双轨制”,一个是“民主选举-总统-对外战略”,另外一个“多党议会-总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

因此在围绕总统选举的民主政治中,“双重对外依赖”与“弹性认同”被直接联系起来。无论是竞选者还是当选者,都需要平衡两个典型而又经常互相矛盾的国家特征:一方面是在“双重对外依赖”中必须做出选择;另一方面则要应对国内“弹性认同”变化对民主政治产生的冲击。并且,不仅“双重对外依赖”本身会随着国家对外战略调整而变化,民众观念中的“弹性认同”也会随着“双重对外依赖”而发生变化,表现在民主政治中,或是对执政总统不满,或表现为选举中存在的明显对立。

2004年,尤先科在总统竞选中落选后,利用自由、民主等亲西方意识形态,依靠“颜色革命”推翻了亚努科维奇“亲俄派”政府,获得了执政权。自此,在左右摇摆的国家政治倾向中,曾经作为“颜色革命”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的季莫申科2004年在担

^① 赵华胜:“原苏联地区‘颜色革命’浪潮的成因分析”,《国际观察》2005年第3期,第7页。

任总理不久后即遭解职,2007年再次当选后一改往日亲西方态度,开始与俄罗斯展开能源外交。在2010年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后,其主要竞争对手季莫申科很快遭到起诉,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等负面形象成为她告别政治舞台的“缘由”。乌克兰这一轮从尤先科到亚努科维奇的总统“轮换”,貌似经历了民主化转型的正常政治周期,其中所掩盖的一些关键问题却给日后的危机和乱局埋下了伏笔。乌克兰仍然没有改变平衡外交理念,依然同时保持着与欧盟和俄罗斯的“双重对外依赖”,在此期间国内民众的“弹性认同”也几经变化,并最终在2013年底做出了抉择。

2013年11月28-29日,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六个东部伙伴关系国的领导人,根据约定应出席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欧盟联系国会议,这次会议将对东方和西方、改革与腐败、俄罗斯与欧盟等一系列问题签署决定性协议。^①而此次会议也意味着,乌克兰需要在俄欧之间做出历史性的“抉择”。亚努科维奇政府最终选择了缺席会议。俄罗斯方面,则为乌克兰准备了低价天然气供应协议和低息长期贷款,以支持亚努科维奇政府改善国内糟糕的经济形势。但是,政府停止与欧盟联系国谈判的行为,却引发了长达两个月并且不断升级的游行示威活动。街头政治从抗议政府逐渐发展为解散政府,要求重新选举。就在亚努科维奇做出让步,同意提前一年进行选举试图缓和国内局势时,抗议示威者却以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将街头政治彻底演变为全国危机。此后,乌克兰陷入彻底失控状态,先是总统消失,继而各地持续混乱。这场危机从乌克兰国内真正走向世界的关键事件,则是苏联时期被赫鲁晓夫赠送给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共和国宣布回归俄罗斯。该地区人口规模大约220万,相当于乌克兰全国人口的5%,主要由150万俄罗斯人、35万乌克兰人、30万克里米亚鞑靼人构成,据统计有82%居民参加了公投,其中96%支持加入俄罗斯联邦。^②自此,“乌克兰危机”中最大的胜利似乎属于俄罗斯,但普京政府却面临着极为被动和尴尬的国际形势。不甘示弱的美国和欧盟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宣布不参加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G8峰会,改为在布鲁塞尔举行G7峰会,这意味着自2002年吸纳俄罗斯以来,首次将其排除在外,七国集团再次恢复为传统模式。而在乌克兰提前一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中,曾经在尤先科政府担任外长的彼得·波罗申科顺利当选,一个亲欧的政府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从“颜色革命”到“乌克兰危机”期间,“双重对外依赖”和

^① Михаил. Троицкий, Самуэль. Чарап, “Дилемма интеграци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No.5, Ноябрь 2013, с.21-32.

^② В.Путин,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Марта.2014, <http://www.kremlin.ru>, last accessed on 22 February 2015.

“弹性认同”不仅密切关联,而且在相互作用时,会使这个国家在不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中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换句话说,“双重对外依赖”与“弹性认同”之间的矛盾,在乌克兰早已存在,但在现实中这两个国家特征发生“化学变化”,则需要“颜色革命”这种特殊的政治现象作为“催化剂”。从这个角度看,“乌克兰危机”实质上就是因为“亲俄派”与“亲欧派”之间存在着持续较量的微妙关系,最终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影响下爆发。进一步而言,乌克兰不仅在对外战略中存在“双重对外依赖”,民众在认同上也存在二元特征的“弹性认同”,两者之间的矛盾最终被“颜色革命”性质的民主政治引发为一场“危机”。

五 “双重对外依赖”曲线与“弹性认同”政治预算线:一个分析模型

从“颜色革命”到“乌克兰危机”爆发,刚好经过了十年,这期间“双重对外依赖”和“弹性认同”的变化以及互动关系,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这说明两个概念存在抽象意义上的“量纲”,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第一,乌克兰的“双重对外依赖”虽然处于被动地位,“依赖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在某些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①但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在对外关系中完全听任于拥有权力的俄罗斯和欧盟。乌克兰所拥有的是选择权,是一个与“退出成本”相关的权力,即“‘冲突’会导致双方退出原本存在的最优经济联系,该成本的大小则取决于具体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特征”。^②

2012年,普京在竞选总统时提出的“欧亚联盟”,至今已经发展为五个成员国,然而却始终看不到乌克兰的身影。如果这是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寻求主导性和控制性的重要战略,但没有乌克兰作为衔接的话,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事实上处于“隔离”状态。并且,在全球化浪潮中,如果没有具有经济地理特征的区域经济背景,俄罗斯要想实现与白俄罗斯、乌克兰的政治外交一体化战略,实际上非常艰难。^③尽管俄罗斯占据着“权力”一端,但也并非随心所欲,因此要对乌克兰“退出行为”高度重视。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说,“双重对外依赖”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权力。反而,“双重对外依赖”拥有了一个巨大的“选择权”,就是乌克兰可以利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较量,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11页。

^② Mark and Crescenzi, “Economic Exit,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5, No.3, 2003, pp.809-832.

^③ Ирина. Новиков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парадиг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Беларусью и Украи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2, Январь 2012, с.123-128.

通过对外战略“左右微调”,寻求有利于自身的优惠政策。

乌克兰对于欧盟最大的意义在于地区安全,而对于俄罗斯而言,乌克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不仅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也是其欧亚联盟计划的战略考量。这说明,乌克兰尽管处于“双重对外依赖”的被动地位,但由于拥有选择的权力,可以使自身获得一些现实利益。正是由于这种状态,在乌克兰“平衡型外交”中,俄罗斯与欧盟对于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反而表现出具有较大的“敏感性”。

然而,从“对外依赖”的“脆弱性”方面看,俄罗斯和欧盟所处的权力地位则有所不同。可以说,短期内乌克兰对俄罗斯依赖的脆弱性更大,在能源、投资和对外贸易等诸多领域俄罗斯都占有优势地位,这种脆弱性主要影响乌克兰国内居民生活、经济发展以及东部地区社会稳定等方面。

乌克兰在长期发展战略中,则表现为对欧盟的依赖“脆弱性”更大。这种“脆弱性”主要影响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和西部地区社会稳定。其中,必然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即乌克兰可以在对外战略中选择,但选择后将会减弱另一方对外依赖所可能获得的潜在利益。

因此,可以认为在乌克兰“双重对外依赖”之中,具有“可度量性”特征,但这种度量没有现实意义上的“衡量单位”,因为其中囊括了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要素,不能简单加总,只具有一个抽象意义上的“量纲”。

第二,乌克兰国内存在“弹性认同”,这个存在于观念之中的主观概念,本身并不具有“度量”特征,但如果附加于民主政治层面之上,就变为拥有“量纲”的变量,并且其“大与小、多与少”已经具有了实质性的影响作用。

现实中,乌克兰总统在选择“亲欧”还是“亲俄”时,应该了解民主政治领域存在明显的政治成本,执政者需要考虑会不会超出限度而导致政局不稳。乌克兰并不具备成熟民主的政治体制,历任总统几乎都以微弱优势当选,必然要面临来自国内反对者所施加的政治压力,因此执政者所拥有的政治空间并不大,一旦消耗殆尽就容易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可以形象地将这种约束称之为“政治预算”。而乌克兰精英阶层更加在意其国家经济的独立性,而不是在后苏联空间获得多少利益。^①因此,这些人对于国家的“亲俄”外交实际上存在很大的不满,经由国内混乱而不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放大之后,导致国家政权体系经常处于临界状态。这意味着,由“弹性认同”所决定的“政治预算”,具有较大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① Денис. Кирюхин,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е проекты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как проблема для Украин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2, Январь 2012, с.118-123.

自乌克兰独立以来,第一次具有民主政治性质的选举发生在克拉夫丘克和库奇马两人的竞选中。选举结果恰恰反映出“弹性认同”对于乌克兰民主政治的影响。在总统选举中,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获得西乌克兰 13 个省的多数选票,而列昂尼德·库奇马则以俄罗斯语演讲,获得了东乌克兰 13 个省的选票。^①“颜色革命”之后,历任执政者上台,更是形成了东西部政治倾向的鲜明对立,甚至还出现重新选举和提前选举等特殊情况。当然,这个“政治预算”的概念,在成熟民主国家一般没有很大的影响,之所以对乌克兰提出了这一概念,旨在说明乌克兰“国内-国际”之间存在这样的制约关系。民众无论是反对“亲俄”,还是反对“亲欧”,都会通过不同政治和社会渠道有所“反应”,由于乌克兰政治基础薄弱、社会形势不稳,因此这种“反应”可以看作当局做出不同政策选择所必须付出的政治成本。

由于乌克兰外交政策大多权衡利弊、辗转腾挪,并非“一边倒”地“亲俄”或“亲欧”,反映在政治预算方面,则表现为不同态度和立场同时存在,但会共同对乌克兰执政当局产生压力。当前,正如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列科谢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一年半之前,乌克兰是在选择俄罗斯还是欧洲,现在则是选择加入欧盟”。^② 2014 年乌克兰国内民意调查显示,对于是否同意加入欧盟,乌克兰国内就表现出明显的东西部差异,并且这种认同会随着时间以及国家战略取向而发生改变,具体数据如表 2 所示。以此数据为例,更充分地说明,乌克兰国内的“弹性认同”是一个具有“量纲”的变量。

表 2 乌克兰国内媒体对民众的加入欧盟的“认同”调查(%)

是否同意加入欧盟	乌克兰全国	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	东部地区	顿涅茨克、卢甘斯克、马克耶夫卡等
完全同意	40.1%	67.7%	44.4%	23.5%	25.8%	15.5%
基本同意	19.9%	21.6%	23.7%	13.6%	23.7%	8.7%
基本不同意	9.6%	3.3%	6.5%	17.7%	13.1%	16.1%
完全不同意	15.0%	2.4%	7.1%	28.9%	22.2%	33.1%
不好说	14.8%	4.7%	17.7%	16.1%	15.2%	23.6%
拒绝回答	0.7%	0.2%	0.6%	0.2%	0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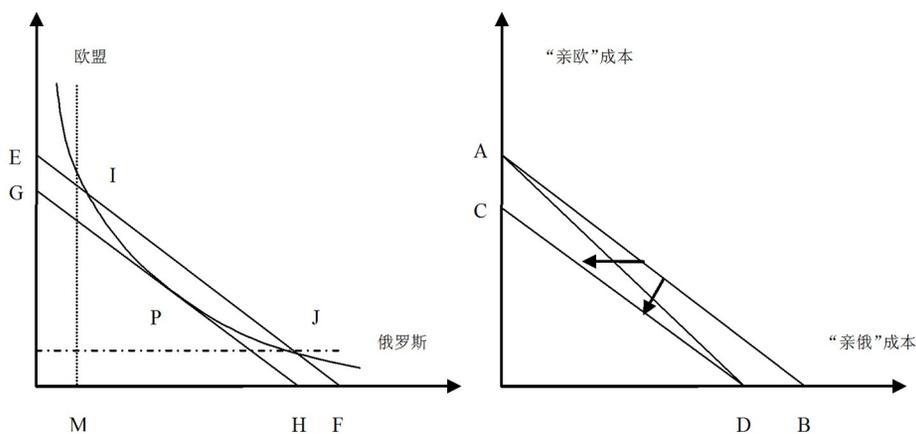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Песня о Родине, Слова народные: Итоги года, Зеркало недели. Украина《ZN,UA》.
<http://opros2014.zn.ua/main>, 2015 年 1 月 17 日访问。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第 144-145 页。

② Алексей. Мешков, Армен. Оганесян, “Еще полтора года Украину ставили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С кем вы-Россией или Западом? а теперь перед таким выбором ставят всю Европ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2, 2015, с. 12-22.

接下来,可以运用“对外依赖”与“政治预算”这两个变量来构建一个分析框架。基欧汉曾经说过:“政治学中盛行的体系分析模式来源于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理论。”^①现实的确如此,在国际政治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中,很多国际政治研究范例都能看到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大多表现为借鉴或启示。在乌克兰分析框架中,可以借鉴微观经济学消费理论中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的均衡模型,根据前文建立的“对外依赖”与“政治预算”,建立一个“双重对外依赖曲线”和“政治预算线”共同组成的简约分析模型。

图2 乌克兰“对外依赖曲线”与“政治预算线”



注:图由笔者自制。

如图2左图所示,一条凸向原点的曲线IPJ(其中I、J为曲线与EF交点,P为曲线与GH交点)代表乌克兰在欧盟与俄罗斯对外依赖中所做出的选择,也是代表乌克兰在对外关系中实际获利和机会成本的曲线,在临近原点处各有一条代表欧盟和俄罗斯所能接受的底线(在图中用不同的虚线标出)。其中有三方面需要特别说明。

第一,在俄罗斯和欧洲的“对外战略”选择中,两者之间替代关系非常清楚,接近欧洲意味着需要远离俄罗斯,反之亦然。但在曲线两端存在特殊性,当乌克兰对外关系极端倾向于俄罗斯或欧盟时,拥有权力的大国会向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此时,乌克兰不仅会失去“退出权力”,美国内政治社会局势也会出现变化。因此,在该曲线左端和右端存在两条垂直虚线,分别代表俄罗斯和欧盟所能够容忍的“底线”。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第二,该曲线的连续主要根据对外关系中的谈判可调整特点。例如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天然气价格谈判,如果关系紧密,则价格更低,并且可以将原有天然气债务延期支付,等等。因此,从抽象和模拟的方法看,在乌克兰对外战略中可以画出一条连续的曲线,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存在无数个对外关系组合点。这一特点在消费理论的无差异曲线中同样存在,两种商品仅仅在理论上有无数个消费组合,但现实中很难做到,例如不可分割性的商品,在苹果和香蕉之间选择,很难做出购买非整数的消费选择。

第三,如果乌克兰“亲欧”或“亲俄”程度加深,那么需要放弃的另外一方好处必然加速下降,因为拥有权力的国家为了阻止该趋势,会有制裁性质的措施出台,这意味着在曲线中,“双重对外依赖”的选择替代率不断下降,因此会具有凸向原点特征。当然,本文的对外依赖曲线与无差异曲线在性质上也并非完全类似,其中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在坐标系中有无数条不相交的曲线,表示不同水平的消费组合,而对外依赖曲线在短期内只有一条,即已经表示了乌克兰对外关系中的全部选择,即在短期内存在一个基本假设,在国际政治环境没有发生特别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乌克兰无法实现同时接近俄罗斯和欧盟的外交方案,自然没有更多的对外依赖组合。

在图2右图中,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表示乌克兰当局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即国内反对“亲欧”与反对“亲俄”社会力量的加总,虽然各派别政见不一,但对于执政者而言,却共同构成了“政治成本”。在政治预算线与两个坐标轴共同围成的三角形,则表示国内政治形势,越是远离预算线,表明政治局势所受压力越小、社会形势越稳定。

这条政治预算线在图形中表现为直线,需要两个假设条件:第一个假设较为接近现实,即在乌克兰国内反对“亲欧”与反对“亲俄”两大阵营基本不会发生改变,即前文所提到的东西部政治倾向的稳定性,可以用两个自然数 a 和 b 来表示这两大阵营(即政治预算可以表示为: $C=aX+bY$,如果 a 和 b 为常数,则直线斜率的绝对值等于 a/b);第二个假设认为乌克兰国内两大阵营可以将对外依赖关系变化及时准确获得,并且能做出支持抑或反对的表现,进而改变各自阵营给当局施加的“政治成本”。

显然,这两个假设与现实相比存在一定的距离,需要做更深的理论抽象,才能证明其中逻辑。这需要将对外依赖在乌克兰国内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深入分析。前文中仅仅在国家层面对上述两个概念展开分析,将国家作为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并没有在国内政治中构建传导途径和影响。本文认为,乌克兰对外依赖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民众反映层面,都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根据是较为严重的对外依赖以及不稳定的国内政局。前者决定了对外战略选择将

会非常敏感地影响到居民生活,糟糕的经济形势又加深了这种影响的严重性;后者决定了政府当局对民众抗议非常敏感和脆弱。

之所以将乌克兰政治预算线近似地用一条直线表示(在不同情况下,理论上可以有无数条直线存在于坐标系中,图中仅用三条代表不同情况下的国内政治预算水平),主要由于“颜色革命”之后形成的不成熟民主政治,在这方面不具备“威权政治”的优势,即不能强制性地稳定国内局势,同时也不具备成熟民主国家所拥有的完善体制。因此,可以用 X 和 Y 分别表示反对“亲欧”与反对“亲俄”的严重或激烈程度,乌克兰对外战略越是接近欧盟, X 数值就会增大,反之则 Y 会增大。这样,表现在图形上,每一个乌克兰对外战略选择,都会有相应的 X 和 Y 值相对应,并且决定了国内政治预算情况。

当然,在政治预算线中似乎忽略了一个群体,即在乌克兰国内存在的摇摆选民,他们究竟倾向于哪一方阵营,这甚至会直接决定总统大选结果。对于这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并非没有纳入分析框架中。由于本文主要分析非选举时期的政治预算,没有要求摇摆群体做出最终选择,因此,可以认为其属于政治温和派,不会对两大阵营分布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此外,即使摇摆群体在非选举周期中提前作出了阵营选择,由于其规模较小,完全可以将其产生的政治影响在 X 或 Y 数值上变化反映出来。因此,尽管没有做出特别界定,但政治预算线仍然可以看作覆盖了乌克兰全部居民群体。

此外,这条政治预算线与消费理论预算线存在根本的不同,后者斜率由两种商品价格比值决定,不会受到无差异曲线上消费组织的影响,而政治预算线斜率却会受到对外依赖组合的影响。具体来说,在短期内这种影响并不会反映到斜率上来,但在长期或政局激烈变动时,政治预算线斜率会发生改变。因此,尽管图形上特别近似,但其中发展变化规律却与“消费者均衡”截然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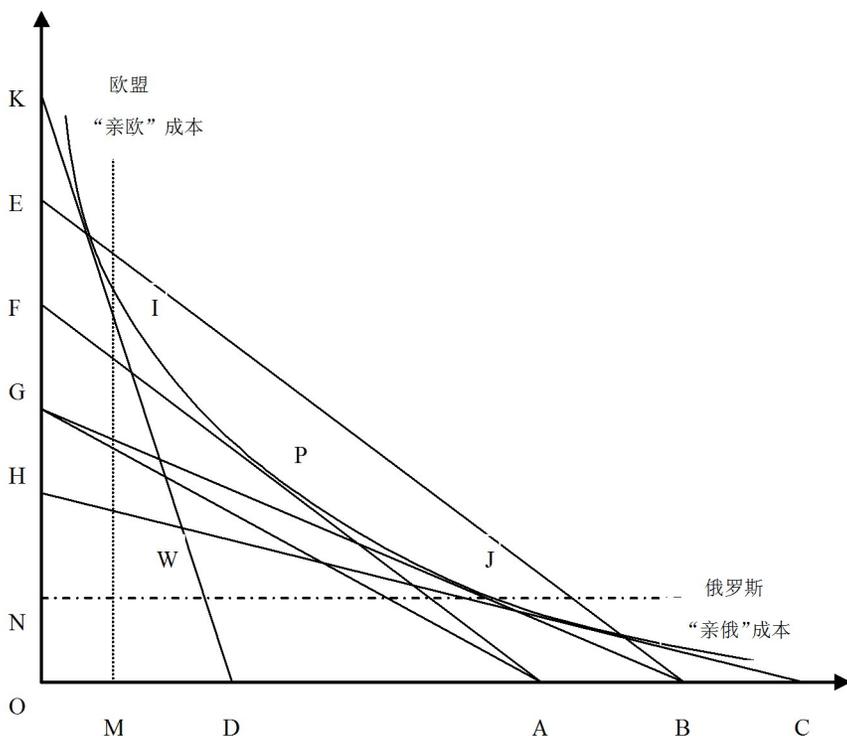
如图 2 右图的指向右下方箭头所示,当乌克兰国内政治形势恶化时,执政当局所面临的“政治成本”上升,其政治预算线会向着原点方向移动。这意味着乌克兰国内对政府支持率陡然下降,其中既可能是由于国内经济社会形势不满而激发,也可能是由于对外战略选择引起国民民众的普遍反对。反之,如果“政治预算线”向外侧移动,则说明执政者获得更高的民众支持率,或是在对外战略选择中,获得了国内各种政治派别的普遍认可,但这种情况在乌克兰很少发生,一般是在新任总统刚刚当选时才会出现。

图 2 右图中指向左方的箭头则表明,在“亲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亲俄”成本提高导致政治预算线发生偏离。出现这种情况意味着乌克兰国内反对“亲俄”政治团体

和派别陡然上升,可能是出于反对乌克兰对外战略倾向俄罗斯,也可能是由于俄罗斯方面做出严重影响乌克兰国内居民情绪的举措。反之,如果“亲欧”成本提高,政治预算线则会向着横轴方向倾斜。

如果将右图中政治预算线与左图合并,则可以获得一个关于乌克兰对外依赖与政治预算从均衡到非均衡发展的演进图形,合并后如图3所示。在这个图形中,对外依赖与政治预算的非均衡将会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种是通过改变对外战略,重新获得较大空间的政治预算;另一种则是在“不断发酵”的政治局势中,最终爆发危机。推导这两种情况的动态发展规律,恰是本文构建对外依赖与政治预算分析框架的根本动因。

图3 乌克兰对外依赖与政治预算:从平衡到危机



注:图由笔者自制。

如果初始政治预算线为EB,那么乌克兰当局可能选择的对外战略应当是对外依赖曲线位于预算线之内的一条弧线。并且,由于俄罗斯和欧盟对于乌克兰战略选择存在底线思维,因此事实上乌克兰可以选择的“平衡区域”应当是弧线IPJ。在这条弧线

上,乌克兰理论上可以有无数种选择,但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必然是此消彼长。在这个区域内,政治预算线实际上也处于变动之中,主要取决于民众的“弹性认同”。如果政治预算线向外侧移动,则当局可以获得的组合将会更多。反之,如果政治预算线向原点方向移动,则当局可以获得的对外依赖选择将减少。

亚努科维奇政府在对外战略选择上,基本保持在“平衡区域”之内,然而由于欧盟联系国协定以及俄罗斯廉价天然气供应,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国内对执政当局的认同感呈现出整体下降趋势,实际上相当于低到对国家战略持肯定态度的最低点。反映在图形之上,即是“政治预算线”与“对外依赖曲线”相切的P点。这种情况相当于“亲俄”与“亲欧”阵营都存在“弹性认同”下降时执政当局所感受到的政治压力,“政治预算线”不断向原点方向平移,直到AF与弧线IPJ相切的P点。

当乌克兰宣布放弃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欧盟联系国协定后,开始出现“亲欧阵营”的街头政治、抗议示威等,这时反而使“亲欧成本”迅速上升,在“亲俄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政治预算线”倾斜变为AG。此时的亚努科维奇政府,只能尽量向俄罗斯寻求援助,通过降低“亲俄成本”来获得新的“双重对外依赖”平衡,“政治预算线”再次倾斜为BG。但是,这时新的平衡点显然已经超出了欧盟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反映在图形上即已位于直线N的下方。并且,“亲欧阵营”同样不会“认同”这种国家对外战略模式,于是再次向执政当局施加压力,经过“亲欧成本”上升、“亲俄成本”下降的调整后,“政治预算线”变为HC,所产生的新均衡点更加远离欧盟,在现实中这相当于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时刻。这时,乌克兰重新进行总统选举,一个亲欧洲政府上台后,相当于重新划出了一条“政治预算线”(KD)。自此,在一个不成熟的民主政治中,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倾向,东部地区依赖于俄罗斯,西部地区则依赖于美国和西方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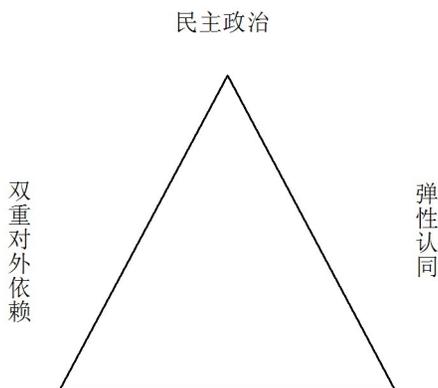
由此,在图3中可以推导出“颜色革命”之后,乌克兰“双重对外依赖”与“弹性认同”这两个国家特征作用于民主政治之上最终产生全面危机。至于为什么在微观经济学中可以无数次实现均衡调整的图形,在对外依赖与政治预算的分析中,却会偏离成为两条代表“危机”的直线?答案很简单,因为在消费理论中,无差异曲线有不相交的无数条,其任意一条与预算线的切点即为均衡点,当某种商品价格变化后,预算线斜率变化产生与无差异曲线的新均衡切点,但无论与无差异曲线相交在哪一点,都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引致变动”,即效用函数与预算函数之间不存在相关性。然而在“对外依赖曲线”与“政治预算线”之间,对外战略的调整只能在一条“双重对外依赖”曲线上移动,并且会通过国内“弹性认同”的变化作用于“政治预算线”,如果均衡点能够保

持在“平衡区域”内,乌克兰可以继续以动态方式进行选择。但是,如果偏离了“平衡区域”,“政治预算线”与“对外依赖曲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发散性特征,即新的均衡点会引起“政治预算线”继续偏离,当最终偏离超出俄罗斯和欧盟所能够接受的“底线”,就会陷入危机模式之中。

六 结语:乌克兰模式的“三元悖论”

在本文分析框架中,“双重对外依赖”和“弹性认同”这两个特征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的情况时,不成熟的民主政治体制会在两大阵营冲击下产生剧烈振荡,这是“颜色革命”以来才具有的特征。前文的分析表明,乌克兰在何时爆发危机、危机是否严重等方面固然存在偶然性,至于对会不会爆发危机这一问题,却可以做出肯定的回答。为了说明这个推理,可以借鉴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三元悖论”^①来进行阐述。

图4 乌克兰国家特征的“三元悖论”



注:图由笔者自制。

如图4所示,等边三角形三个顶点分别代表着“双重对外依赖”、“弹性认同”和“民主政治”。第一种情况,在“颜色革命”之前,乌克兰国家特征应当属于底边状态(这种情况已经属于过去时,乌克兰政治体制很难发生逆转,再次回到威权政治体

^① 即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1999年由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中央银行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三者必须放弃一个,详细理论介绍参见[美]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468页。

制),此时“双重对外依赖”与“弹性认同”并存。因此,这种组合可以在乌克兰存在,不至于引发危机。第二种情况,左侧斜边代表着“双重对外依赖”与“民主政治”并存,这种情况下,国内政治倾向将会通过民主政治影响总统选举和竞选纲领,总统本人也会根据国内政治压力进行对外战略调整。由于“弹性认同”不存在,或是由于国家民族、文化、宗教融合较好(这种情况在很久的未来或许会出现),不至于产生对立性的民众群体,因此也可以在稳定条件下并存。第三种情况,即三角形的右斜边,“民主政治”与“弹性认同”并存,相当于图3中的W点所示,是一种“低抗议水平”的民主政治均衡,即排斥“亲俄”与排斥“亲欧”的力量同时开始下降,这在现实中应当很难出现。

然而,如果从当前“乌克兰危机”视角看“双重对外依赖”能否消失或减少,现实中却并非没有可能。乌克兰的“双重对外依赖”本质属性,来自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和博弈,正是由于这种对立关系,反映在乌克兰对外战略中才出现了具有明显“替代关系”的“双重对外依赖”曲线,因而产生了国内对于不同方向战略选择的“弹性认同”。实际上,如果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能够在重要战略部署方面实现妥协,而不是对立状态,乌克兰对外战略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性必然能够缓解,此时“双重对外依赖”事实上可以在乌克兰逐渐“减弱”,甚至是“消失”。

虽然这里描述的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在“乌克兰危机”东西部地区持续武装对抗的情况下,单纯依靠乌克兰国内力量来实现和平与发展,必然难度极大。在未来,如果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继续以争夺的态势对峙,将会推动乌克兰危机向着长期化方向发展,而如果大国之间能够达成“结构性缓和”方案,或许才是“乌克兰危机”的根本性解决办法。这一观点,权作为本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现实中的体现,是否正确则需要“乌克兰危机”的发展现实来检验。

(作者简介:王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博士后;责任编辑:宋晓敏)